

【编者的话】

中国历史上总是有很多惊人相似的画面。随着中央一声“文化体制改革”的号令，各省市县、部门、行业纷纷制定出了自己的文化“改革”宏图，有些地方甚至在短时间内就已经“硕果累累”，仿佛真的即将迎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然而经历了多年政治风雨的中国人早已不似几十年前，在政治动员令面前，很多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否可以用运动的方式来改变？如果“文化革命”不是发展文化的法宝，那么文化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繁荣发展？

我们注意到，从民间直观的角度，以最近广电总局的“限娱令”为触发点，有舆论认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以权力为准绳，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的限制文化自由发展运动；而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即便是观点迥异的一些所谓左、右两派人士，也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迹象——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证据：经济的物质增长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繁荣进步，而通过人为主观干涉只能在唯物论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当“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种运动被推行时，势必存在改革的主体与客体，那么谁来保证主体意识的正确性呢？谁有绝对资格去训诫别人何为对何为错呢？在本期周刊中，读者将可以看到，作家陈行之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质疑，“文化繁荣绝不是权力可以任意操纵和玩弄的东西，当权力宣称要繁荣文化的时候，我们很有必要警觉，他们试图繁荣的究竟是什么文化？”

对此疑问，历史文化学者朱学勤则指出，世界上迄今两种文化革命的区别在于，一种“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而另一种则是“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学者郑酋午总结认为，“文化一元论就是文化迫害”。而作为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华文化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作家王石也主张“文化要大繁荣，思想要大解放”，而思想大解放的途径，则只能是文化的“自主”与“多元”。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聚焦“文化体制改革”，文章作者包括陶杰、陈行之、左春和、朱学勤、张铁志、陈季冰、王石、北岛、郑酋午、加藤嘉一等，从多角度、多方位为读者提供了知识界对于文化现象的诠释和当前国内舆论对这一重大政策动态的反应。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Google Buzz 分享本期周刊



【疑】

10-1 加藤嘉一：文化有体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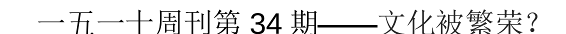
“只有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权力或权利关系形成平等或达到均衡时，中国的文化自觉才能踏上起点，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崛起的道路只好陷入半途而废。...中国政府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人民。”

文化有体制吗?

这是我对 10 月 18 日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的“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反应。

我试图把自己的疑惑与其他外国人分享，寻找解答。一位令人尊敬的以色列资深外交官回应说，“Mr. Kato，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首先，中共从此对社会上的文化生态进行进一步管制之后，中国政治将走向何方？其次，中共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几位来自美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中国问题观察家在与我的交流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简单而论，我的答复是：“中国舆论将进一步收紧，政治改革往后拖延；虽然近年来，左派势力快速崛起令人担忧，但毕竟时代不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国际化程度与文革时期相比有着跨时代意义的不同，中国社会回到文革时期是不太可能的。”

然而，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对我的回答表示不满，重新提出质疑，“Mr. Kato，我在问的是‘本质的不同’，两者难道不都是对政治自由、文化创新、言论自由、知识独立等领域自上而上的干预和管制吗？”

由于水平有限，我没能明确地回答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替我回答。你们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央国策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或想法。我比较肯定地认为，围绕“中国国策的本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在基本认知层面上似乎存在着深远的鸿沟。出于消除误解，增进理解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加强沟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会议是自 2007 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 1996 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作为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人，我深知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上为人类文化发展所做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我们从小受儒家教育，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及思想的结晶注入到每一名日本国民的思想与价值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等，都是日本长期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依据。

201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演讲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其基本思路与背后逻辑很清晰，即“处于改革开放这战略机遇期的当代中国不能光搞经济，还要搞文化。经济发展具有政策优先地位，但随着物质文明的逐渐提升，精神文明也要跟进。那么，能够弘扬中华文明的文化产业将起到关键作用，不带有文化魅力的经济发展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发展是硬道理，文化才是软实力。”



《人民日报》则刊登了任仲平的文章，并谈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据悉，此次会议也着力研究并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三个不适应”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

中共向包括出版、传媒等在内的文化产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上市、融资、并购、出口等分野给予更多行政方面的政策支持属于福音，值得欢迎。中央有关部门的官员向我表示，“我党进一步完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想体系与理论框架。”

我相信，中华回归文化是正确的，中国重视文化是正确的，中共弘扬文化是正确的。在文化在战略层面的意义凸显的此刻，我也预祝中国迈向“文化兴国”的道路顺理成章。

作为来华已过 8 年，平时与中国传媒、出版、学术等有识之士有着一定交往的一名老外，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向有关部门汇报一点实实在在的文化自觉。

中国的民间文化以及为其普及所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关于这一点，中国官方也好，国际社会也好，都了解得不够准确和深入，即使有所了解，其对策始终缺乏智慧。真正先进的优秀文化是超越主权、体制以及国界的，对此，公权力不需要进行太多的指导和管制。

我在中国这些年，在媒体、出版、教育等民间文化现场时时刻刻遇到不得不令人想到本末倒置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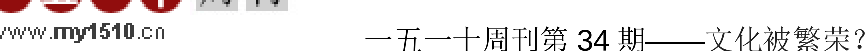
媒体人该忙什么？出版人该忙什么？学者该忙什么？

可想而知，把最新的、独立的、属实的劳动成果奉献给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日益普世化的言论市场。以我观察，中国民间文化人早就把这方面的成果掌握在手里。问题在于，这些成果走不出去，难以面世。

比如，就一位报纸编辑而言，她在忙的是不能报什么，而不是能报什么；就一名出版编辑而言，他在忙的不是能出什么，而是不能出什么；就一名论文撰稿人而言，她在忙的是不能碰什么，而不是能碰什么。就一名电视编导而言，他在忙的不是能做什么，而是不能做什么…我重复一遍，中国民间文化人，不管是什么领域，在平时劳动生活当中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结果，他们正在陷入着史无前例的集体疲劳。







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目前遇到的困惑是一样的。比如，我为一本拙著累积了 20 万的文字，但最终能体现在书页的往往是 13 万字。而那些被“淹没”的文字，至少在我看来，是“最有文化”的汗血。

我坚信，在迈向“文化兴国”的道路上，倘若那些民间文化人“被淹没”的劳动成果和创作结晶纯粹、直接、有机地面向国内外社会，胡总书记强调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一定水到渠成，否则前景极为不乐观。有关人士要明白，真正站得住脚的国家形象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快速推广并总结的，而是通过民间人士点点滴滴的劳动逐渐渗透并赢得的。

我坚信，中国民间早就拥有让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潜质，问题不在于拥不拥有，而在于如何使得民间人士在无制度、心理、政治障碍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与创新。

我坚信，只有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权力或权利关系形成平等或达到均衡时，中国的文化自觉才能踏上起点，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崛起的道路只好陷入半途而废。中共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不是“抓”什么，而是“放”什么，以便促使民间人士集中面对“能做什么”，而非“不能做什么”。

时光流逝到此时，中国政府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人民。

（加藤嘉一，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249）

【返回目录】



10-2 陶杰：中华文化复兴？



“没有自由和宽容，没有思想的解放，则无真正的文艺，只有专制的复辟，绝无人性的复兴。”

西方经济衰退，连美国人也向中国借钱了。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国许多人遂产生“复兴中国文化”的幻想，愤青雀跃，尤为激烈，其情可悯，十分正常。

然而，空言套话，永远比行动效率容易。复兴中华文化，大可拍胸脯承诺，拍脑袋决策。但中华文化如何“复兴”？首先，中华帝皇政治文化中，君臣主奴，家长威权，包括国人经营生意，不信外人，只信子女亲宠，内残互斗，凡事阴谋论，有人说是糟粕，有人说是“国情”，这部分倒不必卖力气“复兴”，一向根深蒂固，而且还加码上演。

除此之外，急待“复兴”的，大家都同意无非是琴棋书画，京戏昆曲之类的中华文化精华了。诗词、对联、中医中药、汉服、私塾，许多人满怀激情，这些传统精致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辟。国人看见洋人穿一套中山装而抱拳作揖，用流利普通话说一句“您好”，无不油然而生“怎么，连老外也会说中国话呀”的欣喜，从而减轻了一点民族自卑，提高自信，倒也不失为美事一桩。然而，全方位复兴中华文化的精华，真的那么可行吗？不妨评估一下冷酷的现实。

文化需要“载体”，犹如打水，总要一只木桶来盛载。首先，我国的传统建筑，亭台楼阁，檐瓦庭廊，就是中华文化主要的载体之一。广州的西关，北京的胡同，山西晋商的古宅，同里的巷陌楼台，宅门深处，古来多富贵人家。富而且贵，中华精致文化，无论锦衣美食，诗礼风流，除了有钱，还不离一个“贵”字。



西关的大屋，就是岭南文化的载体了——厅堂花园，都要对联、书画、假山、盆景来装饰。府主是生意人，但士农工商，传统敬重士大夫，大宅的布置讲究，非要有文化气息不可。“文化气息”从何而来？有钱人家就会雇用一批清客，替他新建成的庭园取名字：潄碧阁、牵云亭，作诗成联，像红楼梦里贾政考儿子贾宝玉的才情，叫一批文人助兴。

还要延聘先生，上门教习，让小孩读诗诵经。老板的八旬老母生日，斥巨资贺寿，搭一座戏台，上演《贵妃醉酒》。每年中秋过节，张灯结彩，吃月饼、猜灯谜，无一不是文化的生活修养。

府宅中，下有长工婢仆，上有姑嫂妯娌，渐成大家庭的政治生态。几房女人，口和心不和，一起打牌时嘘寒问暖，背后互数长短。小孩在这种环境长大，就会见识家庭的人情世故。厨房的伙夫，闺房的乳娘，又有一大箩筐的民间故事：白娘娘斗法海和尚，薛刚反唐，济公巧取华云龙，豪门的小少爷，东窜西跑，耳濡目染，钟鸣鼎食，丝竹传奇，中国文化的熏陶教养，一样都不缺。

中国人社会的结构，本来一向稳定和谐，有一个地主阶级，地主养了一批士大夫，本有一套自足的文化生态，承传千百年，直到民初，西潮东渐。只要不拆房子，不斗地主，文化就不会沦亡，徐志摩从剑桥回来，游杭州六和塔，逛常州承天寺，灵感贯达中西，思绪澈通幽冥，胡适、蒋梦麟、梁启超，都是博达古今中外的通人，王世襄成为传统文化的守墓人。

我国的建筑，是大家庭之所系，中国的富贵家庭，又是精致文化之所依。把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和旧建筑载体毁灭殆尽，就等同把水抽干，把缸砸毁，锦鲤金鱼，何能生存？加上中华精致文化，戏曲书画，围棋对联，像广东人的汤水，都要慢工细活。今日国人的下一代，经麦当劳的快餐脱胎，手机短信的高科技洗脑，生活的节奏早已由美国人来重新定义。只嫌自己的传统文化沉闷，只觉美国的文化爽快，即使电影《2012》再给中国人脸上贴金，中华文化有什么前途？

况且欧洲的文艺复兴，以“人”的觉醒为本，以人性反抗神权的胜利，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没有自由和宽容，没有思想的解放，则无真正的文艺，只有专制的复辟，绝无人性的复兴。今天游意大利罗马，看见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的顶上遗下的不朽壁画《亚当的创



造》，亚当伸臂，与上帝的指尖相触，灵光闪处，此后，风骚 500 年，云蒸霞蔚，世上的缘分因果，一切岂是偶然？

（陶杰， 香港专栏作家、传媒业者。原文链接：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848）

【返回目录】



【史】

10-3 张铁志：在黑夜中寻找星星：台湾七十年代的文化运动



“在这个时代的尾声，黑暗力量重新吞噬七零年代的光，只是这些光线已经犀利到再多的黑暗也遮盖不住。进入八零年代之后，那些七零年代的文化与政治火种，开始绽放更强大的光芒。”

四十年前，台湾开启了此后巨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局。

在台北的文化地標茶馆紫藤卢，这个夏天正在展出一个“七零年代小型刊物展”，包括文学的、艺术的、政治的先锋刊物。展场墙上的说明引用了资深媒体人王健壮的一句话：“那个年代，有一群人在黑夜中抬头寻找星星。”

那確实是个黑暗与黎明交会的年代。在战后台湾，政治权力的控制让整个社会几近窒息，年轻人不是陷入虚无就是感到自己是失落的一代。“自由中国”和“文星”点起了一些愤怒的火光，但很快就被扑灭。直到 1970 年代初期，台湾社会才看见乍现的曙光。让七零年代成为台湾的启蒙年代。

这个黑暗的时代之幕一开始是被外在力量所拉扯破裂的。1970 年开始的钓鱼台争议掀起了海内外的学生保钓运动，1971 年十月联合国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其为中国驻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1972 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台湾陷入战后最大外交危机。这些震撼一方面

迫使社会，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重新思考自己是谁、关注眼前的政治社会问题，並重新认识自己的土地。面对如此巨大变局，他们要把已经鬱积了多年的沉默与压抑解放出来，从他们生活的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岛屿开始改革。

另方面这些外交挫败也让国民党失去国际正当性，而必须向內寻求统治正当性；加上蒋经国於 72 年担任行政院长，要塑造新气象，因而开启了小幅度的政治革新，例如引进青年知识份子、任用台籍人士等。

1972 年开放增额立委选举，党外人士开始竞爭全岛性职位。他们进一步组织化、办政治杂誌。这个鬆动的政治气氛，又使得青年们可以开展不同的文化实践。这场文化运动以这些展出的杂誌作为新思想与文化的平台，成为后来台湾社会力解放的重要先锋。

1971，以吴美云、黄永松、奚淞为主的《汉声杂誌》成立英文版，1978 年成立中文版。汉声杂誌深入民间田野採访，探討民俗、仪式和歷史。

1971 年在报上出现“现代诗论战”，作家关杰明批评若干现代诗人创作大量沿袭西方英美诗的风格与技巧。

1972 年，在纽约习舞的林怀民返台，翌年成立云门舞集，首次公演。

也是 72 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载介绍素人画家洪通的文章。76 三月，素人画家洪通在北市美国新闻处举办画展，人间副刊连续六天的大篇幅报导，引发洪通热。

1973 年外省籍的尉天驄等人筹办《文季》，由本省籍小说家王拓主编，创刊號刊登了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仅三期的《文季》清楚呈了回归乡土的文化潮流：批判现代主义文学、社会意识强烈的乡土小说和探索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

1975 年杨弦举办中国现代民歌发表会。76 年 12 月，淡江大学毕业的歌手李双泽在演唱会上呼吁唱中国人自己的歌，不久后唱出“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同样是 1976 年，试图结合文化与社会的《夏潮》杂誌创刊，並且推出一系列关於本土文化的討论。

1977 年，展开所谓“乡土文学论战”。

综观这些文化现象，几乎都围绕著关於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台湾乡土这两组轴线。文学评论前辈叶石涛指出，70 年代初以来的政治衝击，使新一代知识分子惊觉美日殖民主义者对自己社会的压迫，因而去重新探索乡土。另方面他们想要寻找属於自己民族的东西、寻找属於中国的特色，但因为他们生活的土地在台湾，所以只能以“回归台湾乡土”来重建中国文化。例如云门初创的宣言，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又如 1970 年高信疆接任对七零年代影响甚鉅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也显露出某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情怀。他强调中国的作家应该有中国的特色，应该写自己土地上的东西。或者民歌运动的重要人物李双泽一方面歌唱“美丽岛”这首素朴礼讚土地的歌曲，另方面也写下“少年中国”（蒋勋作词）表达对故土的情怀。

在这些文化杂誌与实践外，还有政治异议杂誌。先是 1975 年的《台湾政论》，是七零年代党外运动的第一份刊物，但很快被查禁。1979 年春天，党外政治工作者创办了《美丽岛杂誌》，並以此为基地集结整个七十年代累积起来的反对运动力量。十二月十日，他们在高雄举办人权游行，但此时国家已经不能容忍社会对党国体制的挑战，於是游行的警民衝突之后大逮捕党外运动的领导分子，並进行严厉审判。

在这个时代的尾声，黑暗力量重新吞噬七零年代的光，只是这些光线已经犀利到再多的黑暗也遮盖不住。进入八零年代之后，那些七零年代的文化与政治火种，开始绽放更强大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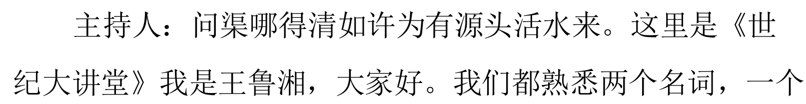
（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65364）

【返回目录】

10-4 朱学勤：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我们都熟悉两个名词，一个叫文化，一个叫革命，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革命，我们其实并不很了解，尤其是当把文化和革命这两个词捏到一起成为一个词组的时候，叫做文化革命这个词我们大家就更熟悉了，特别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父兄辈的这一代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和一段生活经历。那么从文化革命再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思想家朱学勤教授，来给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朱学勤教授。

（朱学勤，1952 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赴河南兰考县插队落户，恢复高考之后相继在陕西师大取得历史系硕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和评论界的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被与誉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已有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等，其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获 1999 年中国国家图书荣誉奖。）

主持人：朱先生您说你特别服膺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梁漱溟对学者做了两种划分。一种是学术中人，一种是问题中人，你说你非常敬佩前一种人，但是您好像命中注定只能做后

一种人。就说您是一个问题意识很强的学者，那么我想这种问题意识的出现一定和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和文化革命的那一段时期，和文化革命这件事情一定有很密切的关系。

朱学勤：当我说我是问题中人的时候，显然是内心是有问题的。我的问题是：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活加上进入学术生活以前作为一个“文革”中毕业中学生，在插队生活中那种热烈的业余的思想辩论，这两者贯通聚焦于一点，我一直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一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灾难最后推到顶峰为什么会是文化革命这样的产物会出现，如果你要问我，我这一生就是想追求什么，其实我并不追求学术上的一些既有的那些比如说称谓呀，比如说地位呀，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学术生活，能够解开从青少年时期就酝酿在心里的这个问题，中国怎么了，怎么会走到那样惨烈的一步。这就是我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直到现在还一直缠绕着您的一个大问题。

朱学勤：不能说到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但是我至少看清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思路何在?我的思路就在于我学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我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围绕着法国革命来的，当时选择这个法国革命作为我自己的专业方向其实内心就有一个问题推动。我在“文革”当中就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经过俄国革命这个中转站，上面的源头跟法国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把法国革命解剖清楚的话，局限在中国（革命）的范围里面讲这场文化革命的起因的话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根思路呢逐渐清晰，就是我们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看到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还有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国革命到美国革命，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在文化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导致的社会后果，民族命运也是截然相反的。

主持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学勤教授，讲一讲他终身缠绕的一个大问题，文化革命。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文化革命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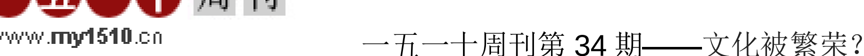


朱学勤：谢谢鲁湘对我的一个介绍，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呢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那个一、二十年代里面，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就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革命”，所谓 1966 年开始 1976 年结束这个“文化革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知识界普遍的否定呢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呢，它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文化革命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知识界，二十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追求的那个文化革命的理想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首先看在 1640 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美革命，那么英美的革命呢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小革命的模式。为什么说小革命呢？英国呢有政治革命，杀了一个国王，再迎回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复辟再把它赶走，把这个国王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请回来，这就长达四十八年的英国革命的这个内容，最后终结在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就是光荣妥协了。那么它是革命，杀了国王，它触动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呢它是在 1688 年以后，马上就是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就是臣民的信仰领域。就政府权利是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

那么它是在 1688 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大部分都是什么，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允许不同的精神选择。所以 1688 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拦绳，撞倒栅栏冲向文化领域。就是革命迫不得已在政治领域发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段进入到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它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什么？共和国，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但是美国革命在 1787 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那美国革命几乎是 0.5 场的革命，它比英国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英美的革命它们内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文化不能碰。

那么法国革命呢，俄国革命就不一样了，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阶段。1789 年到 1790 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第二阶段那么比如说就是吉仑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 1793 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 1794 年嘎然结束，整整一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革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他们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你看在中国人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 1966 年“文化革命”的这个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要强迫人民改变宗教信仰，那么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改名字，改名字啊，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路名改了，把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啊。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啊，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那么法国人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为什么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就大在什么，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也是啊，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东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就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文化革命。那么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用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是最反动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那么我讲清楚世界近代史上两种类型的革命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选择。我认为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898 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那么逐渐地朝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那么“戊戌变法”变的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那么这场变法失败，失败并不说明什么，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 1840 年到 1898 年这个将近六十年，一个甲子，里面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是怎么走向岔路的呢？

一，梁启超逃亡海外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就是把这一场失败，就是指向比如说康、梁集团的，政策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这些，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人谋不臧，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任的是什么文化问题。梁启超的作品到今天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



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梁启超之后那么就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 1917 年 7 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胸顿足说，这次回去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就是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中涌现的就是一个闯将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信守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那么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呢，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这一辈子都是信仰鲁迅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所以你看“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就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 1949 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学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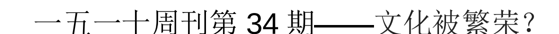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呢，所以到了 1966 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面的这件

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

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的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所以我认为，今天就是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你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再次发生。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矛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面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

等到 1966 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大革文化命。这话错了没有?没错，是这样。对了没有，也没对。就是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时候你喊了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到 1978 年“文革”终于在政治上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知识界出现的是什么呢，“文革”结束了，文化热大讨论开始了。你看“文化革命”、文化讨论，那么文化讨论的这个命题所向也是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千错万错，错在我们是黄河文明，我们错在此前有个孔子，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创造了儒家文化，文化束缚了我们。我想文化热的讨论是在“文革”结束的背景底下展开的，但是文化热讨论的这个逻辑指向和“文革”的指向在否定之中有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的讨论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了“文革”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从“五四”走到“文革”政治上破产了，那么“文革”结束以后知识界又有一场几乎延续十年的文化热大讨论，那么这个文化热大讨论，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继续延续那个文化决定论，模糊人们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的这个认识。

我想当初推出文化热讨论的时候，始作俑者是明白的。因为当时刚刚结束“文革”，整个形势还不如现在宽松，现在我们已经把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写进党的决议，甚至于政治文明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了。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忌讳，所以文化热讨论的少部分始作俑者心里面是明白的，是没办法正面讨论制度选择，只能抚其后背，讨论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软联系。那悲剧就在那里，始作俑者是一个话语策略，跟进的人不明白啊，跟进的人慢慢慢慢就弄假成真，真认为可以讨论的是惟一正确的内容。真认为我们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的。这个文化论讨论就滑稽了，走到后来就出现了一场“荆柯刺秦王”，不是刺秦王，而是荆柯刺孔孟的闹剧。没有勇气刺秦王，而有勇气刺孔孟，其孔孟于九泉之下他也要大呼冤枉的。三千年前的两个思想家，怎么能够为三千年以后的不孝子孙落后于世界来负责任呢?这当中有多少次制度选择的三岔路口你们走错了路。无独有偶，当国内有一部分朋友迷恋文化决定论的时候，海外新儒家这个时候他们学术也进来，只是呢他们把这次文化决定论的几个论证的方向和国内的文化决定论调了一个个。国内的文化决定论是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吗?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那么海外新儒家呢是倒过来说，你们要建设现代化吗这个现代化只能够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面从内向外开“内圣开外王”，从文化里面开出一个现代化。所以两边是以相反的论证，论证同一个谬论。同一个谬论是什么，文化是决定的，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以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共享的逻辑前



提确是一致的，同一个文化决定论。而这个文化决定论从“五四”到“文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示过它的逻辑后果，只是不明白。“文革”否定了，“文革”的灵魂在文化热讨论当中延续下来，文化热结束了，但是文化热还可以在海外新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热的这个方向当中，继续延续下来。所以走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妨碍中国认识现代化症结所在的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农民、工人、商人，他们是有具体的利益选择的。因不同的利益选择，而结出的结结实实的制度性障碍。

最近就是全国人大，北京大学全国人大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有一个报告，他到农村去做了一个报告，发在南方周末整版上。他的这个报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取决于他们是阿 Q，还是赵老太爷，而是取决于他们什么?他们的利益觉醒。阿 Q 就要自己明白，他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的、无偿的圈占，他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民主要求。用不着去读鲁迅改造国民性写下的这个《阿 Q 正传》，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参政民主的积极分子。那么蔡定剑的这个报告就非常重要，他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工人也是如此，商人就不用谈了对不对。真正就是让知识分子自己糊涂起来的呢，就是他天天在书斋里打交道的这个观念呀、精神呀、符号呀、文化呀，他把自己书桌上的这一摊看成是决定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了。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历史是在知识分子观念视野的背后展开的。

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们中国，两句话。我说上帝就是无心让中国人在一百年里面，饱尝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没有受过的这些苦难。



但是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也有眼哪，它在同一块无文化土壤上，它放了三个制度模式，让中国人就是哪一天明白过来看一看，文化是不是决定的。第一个模块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的就是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内地老百姓，但是香港在 1949 年到 1997 年这个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叹不如的。大陆人自叹不如的。正是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 1997 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骂得不堪入耳。

主持人：跟“文革”中间一家分成几派一样的。

朱学勤：跟我熟悉的“文革”当中就是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那个骂，你个就是，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又骂谁谁谁谁。我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你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大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就使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

不必往外面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我想那桌饭一个小时，前半小时加后半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十年文化讨论的书。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我先讲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欢迎你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乃至尖锐的反驳，我们在讨论当再展开这个话题的纵深好不好?

主持人：刚才朱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得已经入了迷了，那么现在是进入讨论阶段。下面我想请这个，把话题交给现场的观众。

提问：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听了朱教授的讲座之后，对于制度的选择到底是由少数人的选择，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决定产生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变迁，而在社会的进程中，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程的主导推动者。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朱教授。

主持人：谢谢这位同学。

朱学勤：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学校讲演的时候也多次遭遇，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是这样：我想一个制度的方向正确与否它确实是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推动息息相关，那么在这一意义上说，一个正确的制度它首先确实来自于什么？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锁定的关系，不，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有权力参与制度选择驳议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是有可能既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也可能把这个方向强行拨向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正好反对的那个方向。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责任，成与败的责任，几乎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看到凡是制度选择正确的地区、民族、国家，那么政治家的选择基本上跟底下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相关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选择，一旦选择了以后，它就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这种支持更新。而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我们也是经常看见，时时常常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但是我们接着看到的第二页就是，每当出现这种选择的时候，它就把一时的成功归结为是什么少数人



的英明，把长久的失败归咎于多数人的愚昧。我想你们是能够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不费劲就能看到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民众、少数政治精英和制度选择之间，这三个层面，在中间这个层面是会发生种种让人意外的变化的，当发生意外的变化的时候，选正确了你也应该承认这就是少数人的英明，选错了你也就应当承担少数人的错。比如说 1787 年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是那五十五个人，在一个叫费城独立厅的地方关起窗帘秘密讨论了三个多月，如果这次宪政选择是错误的，没有理由归结为当时二百万美国人民，就是你五十五个人的错误。你今天正确了，事后宪法草案出来，经过十三州公民的投票同意，投到第九州就成功了，成功了到现在人们还是铭记着那五十五个开国英雄的功劳，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反对一个正确的制度选择和千百万人们利益之间的正相关，我反对的是什么，做对了说自己的英明，做错了是多数人的愚昧，这样的一种教科书的解释。

主持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插一句，因为使我想起萨特说起的一句话，萨特经常讨论这个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所以萨特有一句话说得是很极端的，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

朱学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一段插话，我作为中华民族知识界的一员，我觉得应该和整个知识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历史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控诉、咒骂。我是受害者，不，在你被受害以前，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是参与了导致迫害你的这一场人间地狱的制作的。你的文化革命不打引号的理想，是参与了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洪流的来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反对过去的那个历史学界的讨论，到底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我认为是奴隶和英雄同时创造历史，是英雄的责任不要推到奴隶头上去。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主持人：还有哪一位？

提问：谢谢朱老师，你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一种很不同的观点，然后我想从你的开始从“五四”开始讲的是，你说“五四”之后它有个文化决定论，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然后朱老师提



到是从法国起源，然后俄国中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而朱老师没提到，中国本身历史上的原因，就说比如说汉武帝时候的那种独尊儒术其实已经开始对国民精神方面开始控制了，然后一直到很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朱老师没有提到，我想问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也说“五四”，我理解“五四”最核心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然后一直以来我也觉得它是对思想一种解放，它引入了一些东西，它是对思想解放而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这两点不是很了解，也希望朱老师给我们一个回答，谢谢。

朱学勤：我尽量简短地来回答这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主持人：有可能造成对你讲演的误解的问题。

朱学勤：没有，这个汉武帝这个罢黜百家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除了从中学教科书一直到大学教科书的说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认为董仲舒数提出罢黜百家就是独尊儒术不是来压制民生，压制民权，更多的是用来限制君权，限制汉武帝。

主持人：恐吓皇帝。

朱学勤：恐吓皇帝，吓唬他，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的回答到这里，你可以找到那些资料。第二个呢你说“五四”是鼓吹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呀，不错，完全对，正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国，俄国式的思想解放恰恰就是什么?观念的个性解放，观念的个性解放，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英美这边你去看，在它们早期革命的时候，并不是奔腾的个性解放，而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追究，就是制度选择的保护。这个差别很大。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追究个性解放然后投身新文化的运动的洪流，他们的民主，更多的是什么?个性解放的民主。个性解放的民主下一步就是鲁迅已经说的，鲁迅说的我骨子里，我想深处是个人的无治主义，无治主义在“五四”时期就是安那基主义，安那基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从个性解放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到不需要现代社会的法制束缚的这样一种无法无天，你说毛泽东的青年性格，一直到他“文革”发动就是所

谓，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那种做法，这个之间是能够找到“五四”型思想解放的偏颇以及后果的。

主持人：我做过一个材料统计就是“五四”的思潮中间，引进的西方各种思潮中间，其实是以非理性思潮为主，而不是英国传统的理性思潮为主，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五四”时期大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朱学勤：没有无政府主义的铺垫，他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那句话没说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之前还应该说，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的“五四”型，“新文化运动”型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已经在信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走廊。而英美这边你看一看，无论革命前的所谓思想家，根本没有提出过无政府主义，如果有基本上就不是主流，还是革命当中的领袖人物。无法设想无政府主义底下的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啊，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成为英美知识界，知识生活的一个主要市场，而恰恰是这个东西成为了我们“五四”型解放思潮的一个主干，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解为跟“五四”的正相关关系，能够比目前知识界流行的把它想象成一个负相关关系，能打开更多的精神视野和历史纵深，能够促使我们思索得更多更久远。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学勤教授今天的精彩演讲和在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朱学勤，历史文化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出自世纪大讲堂。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2898 ）

【返回目录】

【放】

10-5 陈季冰：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应放松管制

“只有解放思想、放松管制、加快和深化行政管制体制改革、放宽各类所有制资本的准入门槛、鼓励社会文化创新、让民间文化智慧的自由成长和发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0 月 15 日至 18 日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 2020 年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眼下确实到了必须重视文化建设的时候了。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源泉所系，没有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价值体系，社会便会失去凝聚力和动力，迷失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与我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地位相比，中国文化事业（产业）的落后状况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一潜力巨大的领域本身的开发，其意义绝不会亚于以往的国企改革、加入 WTO 等任何一项战略性改革，必将成为触发又一轮全面繁荣的强大引擎。

文化建设和发展，若就其根本目标，正如全会公报中所指出，乃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而这个根本目标在当下的具体任务，依据我的理解，又当分成互相关联的三个部分，即：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当然，所有这一切，最终实际上都要落实在更多的优秀文化作品（产品）的创作（生产）上。



如同 30 多年来一再得到证明的，要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归根结底要靠重大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今天来看，文化体制的这一改革方向其实已十分明晰，那就是通过政府逐步放松行政管制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政府自身则应当投入更多的资源、花更大和精力完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让公民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因其高度的特殊性而具有特殊的困难。首先，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文化市场也有一个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其次，文化单位还有一般国有企业所没有的“事业编制”问题，这大概是中国独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当然，最敏感和艰难的仍然是最后一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就是所谓“导向”把握问题，这有待于未来重大而持续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明显提速。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出版社已完成转企改制，一些非时政类报刊及演艺剧团的转企改制也在积极推进之中。与此同时，文化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也急剧升温——过去两里，一大批新闻出版和影视演艺企业实现国内外 IPO，融资超过百亿元，中影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等大型“国家队”文化企业目前也正积极筹划上市；以文化艺术品产权、版权等为买卖主体的文化产权交易所（一般简称“文交所”）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央、地方、部委和民间牵头发起的各类文化产业基金蓬勃成长……

就我们的观察而言，文化体制改革在当下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内容生产领域内的重重禁忌难以突破，而文化产品和市场的金融化、证券化——换言之即投机泡沫——的百无禁忌，两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打着所谓“金融创新”的旗号，各地文交所内的“艺术品股票”（准确地说应该叫“艺术品份额式交易”）炒作一度疯狂到了何种程度！艺术品信托、艺术品基金和艺术品拍卖市场里纷呈的乱象与骗局也让人不由感叹：在这个“博傻”的时代，文化艺术的终极价值究竟应该体现为“美”还是金钱？但在所有这些“发烧”般的火热表象背后，中国文化艺术创作累积经年的贫乏和不景气局面并未稍有改观。这种反差说明了一个当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文化领域也如出一辙：政府在该管的地方监管严重不力，而在不该管的地方又管得太严太死。



最后，正是由于文化产业的整体落后现状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软实力的不足以及中国文化传媒在全球话语权竞争中的弱势，许多人正确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必须培育世界一流文化传媒企业。然而，时下有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国家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行政垄断，并对这个领域里的国有行政垄断企事业单位投入更多的资源。

事实正相反，只有解放思想、放松管制、加快和深化行政管制体制改革、放宽各类所有制资本的准入门槛、鼓励社会文化创新、让民间文化智慧的自由成长和发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世界上的顶尖企业无一不是激烈的市场竞争所造就出来的，垄断所保护的永远只能是弱者，文化传媒企业也莫不如此。更何况，文化市场还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属性：几乎不可能依靠我们以往谙熟的那种低价竞争来赢得市场。

（陈季冰，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原文链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64-25786.shtml）

【返回目录】



10-6 郑酉午：我国文化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多元化



“文化一元论就是文化迫害，所以，坚持文化一元论就是要坚持文化迫害。”

文化多元化是新时代的要求，但中共仍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来作为指导思想，这实际上是在坚持文化一元论。2011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特别强调了文化改革所要坚持的文化一元论立场。我认为，在文化趋向多元化的今天仍然坚持文化一元论立场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坚持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



（一）其指导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虽然有许多不同，随着时代进步，后来者也不断对前“导师”的理论进行某些修正，但在其理论上坚持“辩证法、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大点上是一致的。而这三大点也正是他们理论的核心，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大点也已经过时或没有了深度。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包括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辩证法，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著作来看，他们都在赞扬辩证法，都是运用辩证法思考问题。在系统科学产生之前,我们都感到辩证法很科学，但是现在我们已知道它已过时了。实际上，辩证法发展到黑格尔手里时就已经十分完整了，他将辩证法的原理归纳为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和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容与形式、时间与空间、本质与形象、原因与结果、部分与整体等十大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是在这个框架内做修补工作。

辩证法已没有了深度，它已不能深入到事物或者说系统的内部看问题。我们知道，世界是分层次的，有机界、无机界、生命界和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层次中就有不同的规律在起作用。辩证法是建立在古典力学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基础上的，虽然整个世界都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影响存在，但在世界的不同领域其作用的主次是有别的，比如在人类社会中，政治系统虽然也有作用与反作用存在，但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具有目的性的调节而不是简单的作用与反作用。应该说在系统进化的低级阶段，辩证法规律所起的作用强，在系统进化的高级阶段辩证法规律所起的作用弱，比如在生命界和人类社会主要起作用的规律不是辩证法而是自组织性。

自组织性问题已为新科技革命基础理论所揭示，新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同以往的基础理论也不同，它是自组织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分形理论、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是这种理论的系统化。要理解系统的自组织性关键是要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1）远离平衡态；（2）非线性；（3）开放；（4）涨落；（5）突变。自组织系统理论所刻画的系统自组织性演化可概括为：在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和有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非特定输入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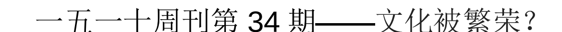
下，系统以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为动力，即以其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为动力，同时受到内外涨落的随机启动，产生出集体运动的协同效应，其协同关联所产生的“序参量”（即集体运动的基本模式）又进一步支配了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从而使系统走入循环、交叉作用并关联于放大的循环链圈之中；于是通过这种有效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过程，系统便经历多种突变、渐变从无序跃变为有序，或使有序程度得以进一步提高，于是系统便从平衡态的混沌走向有序，又进一步演化为包含有序结构的非平衡态混沌。自组织系统理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的系统自组织性演化图景。现代技术和社会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已经不再满足需要。这是用系统科学处理复杂性问题研究兴起的背景。自组织理论标志复杂性探索的高潮。自组织理论认为应该以自组织性为基本概念来探索复杂性的本质和根源。

哲学家们已经根据系统科学创造除了系统主义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可概括为：整体性原理、层次性原理、开放性原理、目的性原理、突变性原理、稳定性原理、自组织原理和相似性原理。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可概括为：结构功能相关律、信息反馈律、竞争协同律、涨落有序律和优化演化律。系统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现代科技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的，很明显，它具有解决自组织复杂性问题的优势，它能为规律和原理建立数学模型，因此它具有深度和科学性。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其建立的科学基础原始和简单，其研究的领域涉及不到自组织的复杂性，其原理和规律不能建立数学模型，所以它不具有深度和现代的科学性。

在专制主义方面，从马克思到江泽民他们在理论上都是一脉相承，都鼓吹专政学说，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鼓吹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和江泽民鼓吹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共产党的“党棍”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新贡献”。1852 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概括了他的学说的基本思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875 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





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马克思的自我表述中，可知“无产阶级专政”是他学说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今天，我们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触目惊心的事件比比皆是。实际上，“阶级专政”是个虚幻的概念，因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家权力为一个阶级所占有、所行使的情况。人们所看到的，国家权力总是为某一“统治集团”所占有。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专政”也只具名义的意义，落实到国家权力的实际操作只能是共产党的上层领导者或党棍。列宁承认“阶级专政”的不可行性，因此提出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能由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伟大“救世阶级”，因而对权力制衡思想不屑一顾，反而对“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赞扬备至。当这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人性中的自利乃至贪婪之心是否会有所滋长?人类为恶的智慧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环境里，“无产阶级”决不会比“资产阶级”逊色。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人。

从列宁开始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比马克思更为出色，他们不仅强调专政，而且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列宁是首先主张一党专政的。当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列宁回答：“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3 版第 24 卷第 423 页）。这种专制主义形式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实行的一党专政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中共视国家为私产，自上而下任命官员，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中共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中共靠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运行，这个统治机器运行的动力就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现在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民主化了，也就是说，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已全部抛去了任何形式的专制，包括一党专政，但中共还拼命抱着一党制这根稻草，逆历史潮流而动。

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实践，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我国，它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都失败了，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范围内已死亡。从资本论第一卷里我们能够了解到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即是：（1）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所有制；（2）社会主义制度下，



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3)整个社会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断分化和改组，最终形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矛盾对立的国际性指导中心——1919 年 3 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和 1923 年 5 月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简称社会党国际。自此，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和路径实践着、发展着。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在二战后的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它们在执政或参政期间，在谋求企业国有化、扩大社会保险、推进公共工程和住宅建设、加强教育事业、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追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的理想，其结果是制度僵化、缺乏活力、企业普遍缺乏效率，所以社会民主党只好开辟新路，即第三条道路。比如，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不再追求社会主义理想，实行公私混合经济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迎来了追求平等的第二次实践尝试，被称为“神奇回归”。西欧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粉红色”。这次回归，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进行理论反思，调整内部政策，放弃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结果。

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使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到 1975 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 16 个。但是，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创。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是经常性的决策失误、重复建设和浪费严重；从微观的角度看是：（1）官僚主义严重泛滥，（2）缺乏效率。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官僚主义和缺乏效率，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已经死亡。

在 200 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两种形态，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西方国家现在是混合经济阶段。当然各国的实际情况又有些不同，英国自 19 世纪末以来，其经济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已不是原先那种单一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成长起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出现了公私经济并存的新格局。在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种形式：（1）个人所有制；（2）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3）国家所有制；（4）合作社（集体股东）所有制。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两大

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所谓“莱茵模式”（西欧、北欧模式），另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这两种现代模式都属于“混合经济”类型的现代经济模式。我国经济现在也已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在中国重新掌握权力后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改革，在将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地在国有制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有企业占有相当比例的混合经济。实际上，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世界经济包括我国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可以把这种经济简称为混合经（mixedeconomy）。现代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正处于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之中。

辩证法已经不能深入研究系统的自组织性问题，已没有了深度，专制主义已经不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死亡；这样的学说还能作为我们国家前进的指南吗？还能指导我们进行改革吗？显然已经不能够了。但是中共还要拿这套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文化改革，这不是要我们的文化陷入死胡同吗？

（二） 坚持文化一元论实质上是在坚持文化迫害

从古至今，专制主义在文化上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文化。在专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向来都是一元的，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在专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向来是一元化的这个客观事实，归根结底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与经济、政治有相互作用，但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影响和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在专制社会中，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由于指导思想是一元的，那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文化只能符合这种指导思想，否则，就不允许存在，不符合这种指导思想的文化创作或者被禁止或者其作者要受到无情的政治或宗教迫害，就像在中共统治的社会里一样，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文化都不允许存在，创作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作品就毫无疑问会受到打击。这是专制社会必有的事情，没有才怪，有才是常态。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迫害，文化一元论就是文化迫害，所以，坚持文化一元论就是要坚持文化迫害。



在专制社会中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最具体的体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最典型的一元化文化。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政权的统治思想，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根本指导思想，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我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也实际上是一元论文化，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文化都不允许存在，都受到压制。

在专制社会确立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仅是关系意识形态导向、关系到文化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专制政权的命运的问题。如果否认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多种思想并存的状态就会演变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最后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专制政权需要高度稳定，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一元化需要强化。

在专制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原则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任何反对专制，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决不会允许处于支配地位，不允许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者一般是用暴力直接维护其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原则，当然，同时也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全部舆论工具和宣传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它成为专制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社会中指导思想决不会多元化，指导思想多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排斥专制主义，因为在多元化的原则下，专制主义不能处于“一元”的地位。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原则对于专制社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对专制制度而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导致专制政权自身的崩溃。对于一个专制的社会形态而言，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必然的。在专制社会专制文化的指导地位，不只是通过统治者的宣布加以确认通过法律来保证，还通过统治者的暴力加以确认。

无论何种专制的社会形态，要真正保持自己的指导思想具有支配地位，还需要有自己的一帮御用文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专制的长期统治中，他们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培养了数目巨大的各种各样有利于维护他们统治的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取得了政权的专制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坚持自己确认的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培养一帮专制主义的御用文人。







专制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原则最受诟病的是阻碍了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扼杀人的创造性，制造文字狱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不绝于耳，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因言论而获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古时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是朱元璋，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是乾隆。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 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制造文字狱规模最大的可谓是“毛皇帝”，他用引蛇出洞之计搞一个“反右”，结果被打倒在中央挂号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十五万，并且他还自鸣得意说：“这是阳谋！”

从古到今，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包括中共，其实是没有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们有用的思想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们没用的思想他就加以摒弃的。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一直是每个民族的精神，它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起着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各类生活方式，它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所组成。在专制社会里，其指导思想是一元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文化自然也是一元的。这种文化显示出来的精神是霸道、专横、野蛮、专制，这种文化表现出来的结果是审判异端、文字迫害。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看，人类在这样的文化中生活了六千多年，现在世界大多数民族已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这样的民族也已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再没有以任何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一元化在那些民族中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共产党统治的今天，我国还是搞一元文化，还在坚持文化迫害。

在今天每个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未来的好坏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中国文化的好坏不取决于孔夫子和秦始皇，不取决于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而是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严格说来，文化差异的背后其实是制度的不同，不是文化的区别而是制度的区别。这两种区别一定要分开，否则我们很多的思考都没有意义。制度不同决定文化差异，因此如果要文化一元化要坚持文化迫害就请选择专制制度，如果要文化多元化就请选择民主制度。不过随着



工业化进程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进，民主已成为大趋势，看来想不想选择已经由不得某个人或某个政党所决定了。

(三) 文化自然是要多元的

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如此之多的人，天然层次不同后天个人经历又会有不同，他们的兴趣和文化需要也就自然会不同；由于人的兴趣和文化需要不同，文化自然是要多元的，因为只有多元的文化才能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

社会主义文化是霸道的，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中，红色恐怖，党棍横行，杀人如麻。这是一种野蛮和残忍的行径，实在不像是人类所为。那些东西必须改造和革新，该抛掉的就是要抛掉，该修正的就是要修正。

文化不只是指某些具体的宗教或学派，而是一个民族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理念，文化就是这种理念的积淀。当然，这种理念有时会通过宗教或学派体现出来，但是理念创造了学派或宗教，而不是反之。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是一元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生形态，就是由多种文化元素相互共存、相互转化、相互生成。这样可以确保文化走向一种健康发达、充满活力、内部存在着竞争协同，最后走向一种富有个性的文化生存形态。

文化多样性是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不仅是文化良性成长的自身要求，也我国将未来建立民主社会的文化基石。事实上，这种交流在多元文化的共处发展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要求既充分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尊重多元文化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现实形貌，同时又能够宽容不同，并与异质文化容纳共处，从而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良性关系状况。可以用《论语·子路》所载孔子的一句名言“和而不同”来表达文多元化的形态。





所谓文化多元就是价值观的多元。价值评判的器官是大脑，而大脑每个人都有一个，这大概是普天下皆同的吧？莫非某个群体是一人一脑，而另一群体却是“共脑人”？没有这个道理。因此，“和而不同”当然是指每个人之间的和而不同。一个群体是否有不同于其它群体的特殊价值偏好？当然是有的。但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共用了一个大脑，并且这个大脑的构造与别的群体有什么区别，而是因为（由于历史、环境等原因）这个群体的每个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各自都有某些价值偏好（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在形而上层面），而这些偏好恰好又有共同之处。文化多元化必然是“文化际”多元化和文化内多元化的统一，“和而不同”、各美其美，不仅应当是“文化间”关系的准则，而且更应当是一个文 化共同体内部人际关系、不同价值之关系的准则。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元化就意味着“自由优先于文化”。

现在是多种文化并存的世界，各种文化都有优缺点，系统科学揭示只有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和协同才会不断推动文化的向前发展。各种文化都有优缺点，这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很多问题，其中也能说明各种文化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既然如此，那么各种文化之间也只能共存竞争。而各文化之间要共存共生首先就需要有宽容精神，事实上只有文化宽容才会有文化自由，文化自由表现为信仰自由、学术自由争鸣、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人们不会因为言论问题而受到追究，除非这种言论诽谤他人、侮辱他人，但因此而受到的追究必须依法进行。

当今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文化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参与国际竞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不可否认，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奋斗，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制造能力、贸易实力都已名列前茅，“硬实力”的提升举世瞩目。但审视文化“软实力”方面，虽然近年来中国文化影响力在不断扩大，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但与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可谓是中国综合国力体系中急需补齐的“短板”。所以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发展我们的文化。

现在的中国已是多种文化共生，各种文化之间也只能共存竞争。但中共当局仍然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把它们抬到至



高无上的地位，其实，这是不符合文化多元论的。在今天全球开放的时代，企图抬高一种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已经不可能了，就算官方宣布是指导思想社会上也不会认可了。现时代需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虽然，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多元文化，但现在的多元文化还只是历史上遗留的东西，中国要发展要想成为世界超强国家更需要今天和以后的中国人不断努力去进行文化创新。

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也是创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精品的必由之路。我们的文化创造，只有不断地在创造实践中进行积极而正确的创新，才能真正有效和有力地突破定势，独辟蹊径，焕发光彩，实现品位、力量、价值与功能的全面重构与提升。当今时代，不仅要求我们的文化必须创新，而且要求我们的文化必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和广辐射的创新。从思想、观念、理论，到内容、形式、方法等，都真正“创”出一个全新的文化天地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不负历史的重托，承担起时代的重任。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文化创新有自身的方式，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途径是：（1）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创新文化。（2）要发扬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中创新文化。（3）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实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互动中创新文化。（4）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文化交往与文化选择、文化批判与文化兼容、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中创新文化。（5）尊重知识，充分发挥文化人的创造精神。（6）创新文化体制是创新文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7）不断发展精英文化。创新发展精英文化意义重大，精英文化往往体现了时代精神，代表着文化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精髓，引领着文化乃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8）要把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结合起来。面对国际文化产业集团陆续进入国内市场的现实，我们如何运用世贸规则进行市场运作，抢占文化产业高地，是一个新课题，未来 10 至 15 年，我国文化产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我们实施文化创新，发展文化，旨在推进文化现代化。文化创新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它为文化人施展才华提供了大好机遇，向文化人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向国家维护好、发展好文化人的利益和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提出了新的坐标。文化创新最终要展现的是文化多元的前景，这就需要为文化多元创设制度前提。所以，政治民主化和放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地位是当今中国文化改革的最重要前提。

（郑酉午，评论学者，任职于深圳清华实验学校。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2906）

【返回目录】



10-7 王石：文化要大繁荣，思想要大解放

“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活，别人也要活。...我建议加上‘尊重多元’。”



说得痛切一点，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未必一定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极可能是在长期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法呢？什么又是社会主义音乐？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因为崇尚自由、反抗压迫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好，但我会讲真话。

近日到湖南，看到一种新酒，说是黄永玉取的名字，名叫“内参”。是说酒后之言可为内参吗？不得而知。但目前确有两个语言系统。一是文件语言、会议语言、表态语言，即“套话”；一是酒后之言、饭桌之言。两种语言系统并行不悖，习以为常，这也是一种文化。

我主张，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应该真诚，没必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更没必要说假话。

说得痛切一点：我总感到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或者刚刚举行了开幕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未必一定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极可能是在长期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

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法呢？再要“传染”开去，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音乐，岂不更麻烦？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活，别人也要活。你说这样好，别人说那样好，奈何？唯一的方法是和谐共生，不能老想压迫谁，更不能老琢磨灭了谁！

“文革”期间，我国政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可那个年代还产生了《我爱你，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哪个人不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因为崇尚自由、反抗压迫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指导思想比文化体制改革更重要

执政党“十七大”提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文化上论英雄，不看数量，主要看质量。看有多少大作，出了几个大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短短几年，能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作家有一大片！

改革开放 30 年，再往前数 30 年，能数出几个大家，几件能称为大作的作品？“十七大”说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小发展小繁荣，也不是中发展中繁荣，我只能说，还没有出现预期的景象或势头。去年在宁波镇海开会，我与王蒙同志谈到文学评奖。我说这些年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学样式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手机短信，精彩。

影响、制约、束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的看法，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还不够解放。“解放思想”，主要发生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如：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移，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等。

改革没多久，有些老干部到深圳特区一看，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多大的思想震荡！文化领域有这么大的震荡吗？思想有这样的变革吗？我认为没有。说得痛切一点：我总感到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或者刚刚举行了开幕式。

我认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要务，是转变指导思想，转变文化观念。与之相比，文化体制改革是第二位的。

具体而言，至少要实现三个转变，即：由阶级论转为和谐论，由一元论转为多元论，由从属论转为自主论。

这里的“和谐”、“多元”以及不再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将文化与经济、政治并提，都是党中央的提法。我只不过是谈自己的理解罢了。

由阶级论转为和谐论

也许，当初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现实的、直接的目标，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纲。但我看，这一“否定”却有全局的、理论的甚至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意义。

不必过多叙述历史。从 1920 年代革命文学，1930 年代左翼文艺运动，1940 年代延安讲话，1950 年代提出社会主义文化，1960 年代发动“文革”，到 1970 年代拨乱反正，说我们文化运动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恐怕没人反对。有许多次文化批判，例如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批判胡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丁玲，批判梁漱溟，批判马寅初，批判杨献珍，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批判《水浒》，批孔。

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改变了没有？我认为，说法上有所柔化，程度上有所减弱，但还远远不够。余秋雨说怀念上世纪 80 年代。他说得不确切。1980 年代只有一段时间文化界心情比较舒畅。

我百分之一百赞成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的四个字“和谐文化”。我百分之一百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继续坚持阶级斗争。这一点必须在基本原理上讲清楚。

党中央倡导理论创新，倡导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对于基本原理的探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当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有的老同志给耀邦同志打招

呼说，理论问题要谨慎。耀邦同志回答说，“不，理论问题要勇敢！”我至今认为，这句话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气度。

我有个初步认识：阶级、阶层是普遍存在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阶级、阶层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什么？可能是依存、依赖、合作、妥协、共生。阶级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甚至在某些时期可能激化为剧烈的、疾风暴雨式的斗争。但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阶级关系必将日益走向共同利益下的理性调整，包括在道德、义务、同情、责任参与下的法律和社会契约中走向和谐。所谓阶级、阶层的成员，也是在财产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改变和再分配中变化的。

其实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否定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论断。“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更从世界观的高度提出了新看法。

在思想文化领域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势必颠覆许多观点。许多出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阶级的思想、道德、文化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超越阶级，超越时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毛泽东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这勤劳勇敢、热爱和平是什么阶级的呢？

去年 11 月，我在第七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提出，两岸不仅应展开经贸文化交流，也应展开政治交流。从“和谐”、“和而不同”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未必一定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极可能是在长期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正是和谐的思想吗？应当从这样的理论高度，认识“和谐文化”。

由一元论转为多元论

我们向来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而且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式的反映。文化上一元论的看法，充满着革命的热忱、伟大的理想，也是真挚的。只是，而今反思，也不够成熟。一

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的画图，是的，但不能把历史看作一张白纸，不能说“俱往矣”，你们都不算数，我来了，一切要重新来过。

从所有国家的实践看，而不是从空想出发，就会发现：任何时代、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的文化都不可能是一元化的。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也都不是一元化的——这里说的是文化的存有状态。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从《论语》、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到胡适、鲁迅、陈寅恪、王国维；从梅兰芳、尚小云到张艺谋、赵本山；还没有说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与生活方式；更没有说到美国大片、日韩时尚等——除了“多元”一词，还能以什么概括呢？去年，我参加“国共论坛”，听到吴伯雄先生讲了一句话：“文化是多元价值的总和”，非常正确。

我们恐怕应当重新思考，一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下的文化，当然会受到那个社会制度的影响、促进或者制约。但文化的内容并不是与制度简单对应。美国、日本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很少听到他们说自己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是说美国文化、日本文化。

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应当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概念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也许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我内心磊落，并不想隐瞒观点。我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正如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明确的。

但是，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如果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曹雪芹、王国维，再加上美国大片、小沈阳的二人转，统统都叫“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词语还有意义吗？

约 30 年前，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书法》杂志那时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开创社会主义书法新局面》。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死？因为那时





我认真想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法呢？是指书写内容还是书写者？或者“二王”、欧、严、柳、赵、米、于右任都算？再要“传染”开去，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音乐，岂不更麻烦？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活，别人也要活。你说这样好，别人说那样好，奈何？唯一的方法是和谐共生，不能老想压迫谁，更不能老琢磨灭了谁！

具体到每个人，从信仰、主张、价值观念，到见解、爱好、趣味，甚至偏见，更是多元的，无法统一的。

以我个人为例，我写过论鲁迅小说的文章，十几万字，但我不喜欢鲁迅的小说，觉得还是他的文章好。钱锺书是巨匠，我很敬佩，但他的小说我也不喜欢，尤其是那些卖弄聪明的俏皮话。我看王蒙的评论比小说写得好。我喜欢阿炳，喜欢《二泉映月》那种苍凉、伤感和真挚。可我不喜欢刘天华，《空山鸟语》、《病中吟》、《光明行》都不喜欢。我觉得做作，无病呻吟。我要写现代音乐史肯定不写他。当然，幸亏也没人让我写。

我整体上不接受“百家讲坛”，尤其不接受于丹，主要不是内容，而是状态、语态；更不喜欢《复兴之路》一类图解历史、图解政治概念的各种纪念演出，我们这一代人对“为政治服务”已经形成了本能的反感。《卧虎藏龙》名气那么大，但是故事很差，看不下去。《英雄》简直不知所云；“三枪”我看了片花、宣传画，没敢看片子。

我更不喜欢各种演唱会，从“同一首歌”到“中华情”，在我眼里跟夜总会走秀没什么区别。这恐怕与年龄有关。而今服装时尚里有句话“垃圾般的雍容华贵”。我这个年龄只能看到“垃圾般的”，看不出“雍容华贵”，也看不出“抹布之美”。

我的这些说法都不是文艺评论，而是个人化的趣味、偏见。但你要让我改变，那很困难。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给多少钱都不喜欢！这类事，不要追求一致。

既然是多元并存，如何对待多元？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属一元的那些“元”？这是一次考试。我极赞赏党中央关于“政治文明”的说法，文明不同于文化，文化可以各种各样，可以是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但文明只意味着进步。世上有不讲理的文化，但没有不讲理的文明。不讲理不叫文明。这是一个极严肃的问题。



长期执政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社会、多元文化，至今仍缺乏必要的讨论。不能满足于提一个观点，提一个口号。有一句话叫“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什么叫“引领”，别人不买账怎么办？这类问题不仅要有观点，而且要有学说。不仅自己要想清楚，说清楚，还要说给国际社会，说给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听。即使不能说服别人，起码也要让人家感到言之成理。

我们在国际上是真诚的多元论者，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讲过多次。因为要面对政治的、文化的单边主义，甚至霸权主义。我们有些弱势，话语权不够，因此主张多元。回到国内，现在提“一元引领多元”，我建议加上“尊重多元”。

（高）占祥同志发明了一个说法，叫“敬其所异”，说是要对不同的东西表示敬意，与其说这是一种气度，不如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认识。无论思想、创作、评论还是生意，都有这个道理。那些不同于你甚至反对你的元素，也许正是你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动力！占祥的这个见解很深刻。他甚至说，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应该感谢自己的对手，感谢自己的竞争者，感谢自己的反对者。

由从属论转为自主论

与经济、政治、社会相比，文化有没有相对独立自主性？

过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影响了几代人。它显然不利于文化、文艺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又多了一个主人：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这几年，党中央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同时并举，现在又加上生态环境。文化堂而皇之与经济、政治平起平坐，这是党的文化观念的进步。但是，真正改变从前文化与政治的主仆关系，还有很长的路。

而今，中央提出要解放文化生产力，要增强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不研究文化的规律是不行的。这是大题目，我只能略说一二。



举个例子，产品会更新换代，像计算机、手机，先进的、高质量的出来，就会代替落后和低质的。

但就文化而言，则是另外的情景。不会因为屈原就淘汰《诗经》，也不会因为李白、杜甫就淘汰古诗十九首，淘汰曹氏父子，更不会因为毛泽东、艾青就淘汰李清照、苏东坡、辛弃疾。学术以及书画、音乐、戏剧等方面，莫不如此。文化、精神的生产和产品往往是一层一层累聚起来的。往往是时代过去了，文化却留下了。但史书也不会越写越厚，厚到地球放不下。文化也会淘汰，但它的淘汰和物质产品的淘汰不完全相同。所以，在文化规律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再如我们常常说，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带来文化发展的高潮。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也希望如此。但这不是规律，也没有必然性。“文革”期间，我国政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可那个年代还产生了《我爱你，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产生在“大跃进”年代。起码从音乐上说，改革开放 30 年，并没有出现可以和以上三个协奏曲媲美的作品。

你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要认真研究，不能满足于喊口号，更不能乱喊口号。文化发展是有自身规律可寻的，不应将文化看作是经济、政治的附庸、奴仆，文化有自身的、相对的自主性。

说到自主性，就不能回避与精神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由问题。现在，锦涛同志多次讲理论创新，讲创造活力。2009 年 12 月 7 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汤一介先生的访谈，题目是“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汤教授说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话：“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应该感谢汤一介敢讲真话。也许汤先生以为到了不说不行的时候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环境宽松了很多，不但可以说，而且可以登载出来。



“自由”一词，不知从何而始，因何而起，几乎已成为一个负面的用语。我们对自由的误解基本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自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很虚伪的东西。二是认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法无天，那还得了？

这两点在中国人心目中印象很深，应加以辨析，首先，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哪个人不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因为崇尚自由、反抗压迫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学者们也同样是以负责任的态度讨论自由的，比如，罗素就曾反对放任的、无秩序的自由，认为不受任何外在控制的自由势必导致混乱，导致强者侵犯弱者。不少学者强调，不同于“原子个人”的“社会自由”，是更具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的自由观念。而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社会自由，是在社会需要、法律规范、社会契约、社会公德等条件下实现的。

我极相信，汤一介先生重提自由，意在推动文化创造力的发展。这些思想，与中央精神一致。锦涛同志在十七大就曾提出“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再比如，什么是“以人为本”？据我看，就在于承认无论经济、政治、文化，也无论国家、社会，通通都是手段，只有人是目的，是最高价值，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人的最高需求是什么？当然是温饱、安全、爱情之上的自我实现，即人的创造力的自我实现。“以人为本”的含义之一，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在必要的社会制约中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享有思想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幻想的自由，以及表达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并以此为前提，发展它的创造力！

（王石，作家，文化评论人士，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原文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9872191.html）

【返回目录】



【径】

10-8 北岛：民族文化复兴之梦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

2007 年春我住纽约，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它展开了 19 世纪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机遇与命运，时间跨度从 1833 直到 1868 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伦敦、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之间转动。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多一二十个人）的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话剧后，我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在纽约有过一系列讨论。话题散漫，但焦点集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时此地，即 2009 年 10 月 3 日在香港——回首与展望，让我深感悲观甚至绝望：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如果可借用这个词的话）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教育的代价、公民权的代价，等等，对我来说，最大的还是创造力的代价。纵观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志士仁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在文化上在文学艺术上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呢？恰恰相反，到处是贫瘠与空旷，尤其在中华文明遗产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衬下更加触目惊心。



那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混乱。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在黑暗中——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话，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一种中国式理想的文化情怀。回首历史，朝代更迭与经济兴衰如过眼烟云，最终留下薪火相传的文化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 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

而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关键，包括对汉语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使之达到古汉语的完美境界。实现这一梦想有几个基本条件：

一、对中华文明遗产的疏理与重新定位，包括对“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矫正，让诸神复活，成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新动力。

二、以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为目的，修订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汉语基础写作成为大学必修课。同时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权威机构——汉语文学院，重写文学史，编纂相关辞典及各种文类的推荐选本等。

三、废除由国家豢养作家的体制，创办多种形式的国家与民间基金会，支持严肃文学写作，并拓展民间文学刊物的生存空间。

四、扩大以民间为主的国际文化交流，为汉语作家提供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机会，甚至提供在国外短期居住与创作的可能。

五、为了让翻译文学当成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专业的文学翻译队伍，提高翻译稿酬，并在出版前对翻译质量严格把关。

六、建立独立的文学艺术批评机制（与民间文学刊物相配合），批评与鼓励兼收并蓄，划清严肃写作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的界限。



以上六点只是基本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往往都不可预测。但我相信钟摆走到头将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终会厌倦或摒弃以物质主义为代表的时代潮流，集体反抗将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带来新的转机。

从此时此地到 2049 年的中国，隔着四十年的不测风云。谈论未来就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正是人类做梦的能力，“彼岸”正是梦的边界，而因为有了这种能力和边界，人类才有了方向和目标，才不会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说在纽约的讨论是前奏的话，那么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原文曾发表于新浪网，本刊所发为作者直接赐稿。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2914）

【返回目录】





10-9 陈行之：文化繁荣的条件



“文化繁荣绝不是权力可以任意操纵和玩弄的东西，当权力宣称要繁荣文化的时候，我们很有必要警觉，他们试图繁荣的究竟是什么文化？”

1

听说，又要繁荣文化了，作为中国人，我等难免要激动一阵子，手而舞之，足而蹈之者，也大有人在。然而激动之余，摸着脑袋想一想，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那么对头：文化是这么个繁荣法儿么？这样能把文化繁荣起来么？

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一认真，发热的脑袋就冷静了下来，就要更深入地琢磨一些事情；凡事一琢磨，就会显露出内在机理，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的。”

事情是怎样的呢？

2

我们把话题扯远一些。

14 世纪至 17 世纪，发生了一场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始，逐渐扩展至欧洲各国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在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更在新教伦理的基础上奠定了导致人性极大解放和社会经济极大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从



此，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资本主义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它的精神遗产一直绵延到了当代，甚至可以说，目前的世界格局仍然渊源于发生在五六百年之前的那场文化复兴运动。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文化复兴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呢？依照我的愚拙想象，那时候意大利一定是出现了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一定是出现了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政府，一定是出现了被国家意志严格操控的意识形态，作为这一切历史条件的后果，所以才产生出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复兴运动并且结出了累累硕果。

想象当然不能替代历史，翻开史书，白纸黑字让我大为惊讶--那场著名的文化复兴运动竟然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的意大利政府似乎也没有专门召开全国性会议，研究、讨论和制定繁荣文化的国家战略，相反，在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张扬个性、反控制、反禁锢的气氛，所谓的大繁荣、大发展都是在民间社会兴起、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础上取得的……一句话，所有那些事情的发生，都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现实风马牛不相及。

难道是我们大白天的撞见鬼了么？难道是历史存心与我们作对么？

我们还是来回望历史。众所周知，西欧中世纪是一个“特别黑暗的时代”，黑暗在什么地方呢？黑暗在：基督教教会事实上行使着国家的职能，成为了凌驾在所有人头上的国家力量。这种作为国家的超级力量为了控制人民，不仅建立了一整套森严的等级制度，掌控绝大多数国家资源，攫取和占有大量国民财富，还千方百计利用宗教对人民进行精神麻痹和思想禁锢，把上帝解释为主宰世界的绝对权威，对世界的任何见解都要以《圣经》的解释为准，谁也不能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其进行制裁，甚至被处死。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的精神生活载体的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由于被人为地切断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只能枯萎，被国家认同并喧闹于一时的，只能是“纵做鬼，也幸福”式的伪创造，这就是说，攫取了国家权力的统治者为人的精神创造输送了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天地之灵的人只能消失，让位给国家意志，让位给国家，让位给占据国家权力宝座的人，让位给盘踞在各处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

罗马教会之所以严厉查禁薄伽丘的《十日谈》，不仅因为这个不谙事理的家伙揭露了僧侣们的荒淫和伪善，让道貌岸然的僧侣们很没面子；也不仅因为他怀着温爱之心描写了普通男女之间的炽热爱情，让人直立在人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动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让国家没了面子，让普通人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人。

3

这个世界之所以让人们抱着期待，就是因为它总是在人的意义上向真善美的境界发展，而不是被那些号称代表了上帝和人民的人拖向地狱。

中世纪后期，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孕育，为文化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正是这种历史条件，遮护了人的精神创造，那些先哲们才创造了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历史的新人才登上历史的舞台，正是这些人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精神遗产。

正是这些人文主义者挥舞着自己的旗帜，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响亮呼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人，我拥有人的一切特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势力对人的奴役，反抗教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总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处在传统神学束缚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们终于认识到，人是一个独立的具体存在，不是教会（国家）的附属物；人的意志为人所独有，它不是国家意志的延伸；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大，即使国家也不比人重要……这既是文艺复兴之因，又是文艺复兴之果，没有这个东西，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存在。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遗憾的是，这个伟大时代不是国家力量制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是在摆脱了国家意志的禁锢和操控之后，才像巨人那样迈着大步，进入到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听到隆隆的脚步声。

4

文化繁荣绝不是权力可以任意操纵和玩弄的东西，当权力宣称要繁荣文化的时候，我们很有必要警觉，他们试图繁荣的究竟是什么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还是党文化？！当国家权力用强力把人从文化中剥离，将文化变为对人进行精神控制工具的时候，我们很有必要问一句：在这种文化中，有你的位置吗？有我的位置吗？有他的位置吗？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位置吗？

这不是对未来的忧虑，而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警示--城市居民每天都在遭受强拆，城市文化遗存每天都在遭到破坏，农民每天都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每天都在贪污腐败，权贵们每天都在巧取豪夺国民财富，农民工每天都在中世纪式的残酷剥夺中挣扎……等等这一切社会乱象，你在我们的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广播、电视剧、音乐、雕塑、绘画等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中，找得到相应的反应吗？你找不到。无所不在的审查制度把这一切都剔除干净了，你看到的听到的全部都是国家让你看到和听到的，那只是一些连鬼也不信的意识形态喧嚷，是虚假的歌舞升平，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伪饰的和谐！他们宁可纵容没有思想的低俗，也不能容忍有思想的崇高；他们宁可让人的文化贫瘠而亡，也不让生活的脉流给它输送血液；他们宁可让整个艺术天空肃杀，也绝不允许透露一丁点儿生活的真实……我再说一遍，我描述的不是未来，它就是今天，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






5

如果国家大张旗鼓地繁荣的是这种排除人的现实存在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那就只能意味着人的位置的进一步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文化繁荣的条件”，其实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然而，既然已经列出了标题，并且顺着这个思路写了这么些文字，你最后总得有一个说法吧？

说什么呢？让我们从文艺复兴运动中寻找启示吧！

如果没有人的旗帜高高飘扬，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坚决反抗，如果我们不能够用生命呼喊出人的声音，所谓的文化说穿了不过是一种异在，一种强制，一种剥夺……这样的文化如果真的繁荣起来，对我们是灾还是福呢？

我不知道。

（陈行之，作家。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2918）

【返回目录】





10-10 左春和：文化要繁荣，但不要运动

“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人们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广阔度和自由度，是一个社会对多元思想的宽容度和欣赏度。”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研究的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可以说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是一个迫切的期待，如果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无法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更无法维持建设和谐中国的继续进行。文化的魅力和作用，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基本上已在形成共识：没有文化的国家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没有文化的人也是一个生活方式不健全的人。在此背景下，似乎一种文化大发展的契机已经到来，举国上下，文化滔滔，从权贵到庶民都在谈论文化。文化再一次成为资本时代的泱泱时尚，文化终于成为像 GDP 一样的关键词之一。

然而，文化不一定有 GDP 那样的幸运，也不一定能像 GDP 那样被言行一致地追求。文化的推动和发展自有它本身的规律，如果良好的愿望不能建立在科学的路径之上，不但事与愿违，还会失掉发展的机遇，或者走到目标的反面。因为“大发展、大繁荣”在鼓舞人心，热血难免沸腾，对于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也难免歧义丛生。

要提防文化发展的运动化

当前，对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明显的误区在于忽视文化的发展规律，在于把文化发展运动化。运动化的结果将使我们无法看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还会是真正文化精神的丧失和造成新的某种灾难。



这种运动化突出的标志是：大会小会讲文化，把文化从无人提起到奉若神明。文化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要往里装。但会议一结束，连大讲文化的人也不去发展真正的文化，也只把文化的发展挂在口头上，摆到会议上，写在标语上，忙于庆典上，笑在剪彩上。很多地方热衷于组织街头演出和各种晚会。锣鼓喧天，彩旗飘舞，灯光四射，似乎这才是文化繁荣的景象。可是这些街头活动不仅制造了城市噪声，还误导了文化的发展方向。而那些所谓大制作的晚会也不是演给大众的，多成了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华丽交易。

其次对于规划的滥用。由于文化的发展欠账太多，各级部门急于借用发展经济的方式来发展文化，各种量化的文化发展规划纷纷出台。其实这种规划也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落实，因为文化的发展不同于工业生产，并不像工厂盖好后明天就能冒出烟来。文化园区建好了，不等于文化就来了。各大城市文化创意园区没有创意、没有文化，只有咖啡厅、饭店的尴尬场景已成为大搞文化规划的反讽。这些规划导致了公共财政的配置冲动。文化的投入近年来确实很多，但并不等于所有的文化领域只要财政投入马上就有产出的。目前的问题是，县乡一级公共文化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而在省以上部门则进行大投入制造各种实景剧和所谓文艺精品(专为获奖)。这些制作在权力之手的作用下完全随权力的脸色行事，成为文化运动中典型的形象工程。

此外，文化乱象还有很多。大拆大建成高潮，在新一轮城市病的影响下，所有旧的破的都是落后的文化。一派大拆运动中千年的文化基因连根拔起，代之而起的是千城一面的水泥丛林和玻璃幕墙，历史文化只能躲在荒郊野外哭泣;还有形形色色的文化下乡活动，一派景象，热闹非凡;各种名义的文博会，各地进行招商和签约数字大战，亩产放卫星的现代神话因文化大运动而再一次上演?

在这些形式化、表面化的文化大运动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表面上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普天同庆，一方面表现出了人们对这种文化形式的强烈厌烦。一方面是文化形式的供给过剩，一方面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严重贫乏和心灵的极度干枯。一方面是从上到下指手划脚的繁荣，一方面是人们无法找到自己的多元文化需要。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文化，也不是投入不足，更不是人力有限。党和国家的最高会议都在讲文化，各级财政也在倾向文化，宣传、出版、文化、广电、文联等众多的部门都在直接办文化。可以说

我们对于文化的重视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没有宣传部，也没有文化部的美国是望尘莫及了。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发展在如此机遇面前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呢?显然不是重视不够，而是我们对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错位，急功近利地在文化发展中照搬了经济规律和运动传统。在推动文化发展中又未能转变政府职能，本来应该宏观管理的事情，总是在微观干涉，既造成了资源的重复、浪费，又把文化的发展引向了歧途。在文化资源的配置部门也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繁荣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只是一味在追逐形式、追逐热闹，除了在追逐政绩工程外，还是在追逐利益。如此一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必成泡沫，最终泡沫破碎，恐怕连文化的影子也不能找到。

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什么

如果要避免文化发展的运动化倾向，首先应该弄清文化和繁荣的标志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但是最难以让人弄清楚的，已有多少人误把文化的边缘当成了文化的核心，把文化的装饰当作了文化的本体。文化远不是那些在街头扭秧歌、敲锣打鼓之类的民间活动，也不是搞几台音响灯光现代化的晚会，或各级电视台那些令人作呕的娱乐节目。

文化是弥漫在每个人心中的精神追求，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充盈在人生坐标上的信念支撑和价值向度。文化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代表了与庸俗拉开距离的道德提升。在文化生活中，人除了获得精神生机外，还有着对于生活和人生的反思。所以，文化是渗透在人的价值追求中的一种精神气质，它因此造成了我们对物质一元追求的二度分野。文化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抗衡那些对社会最低限度伦理共识的冒犯。它并非出自什么神圣的计划或规划，它出自人类深不可测的理性源头的内在自省和确证的独立性。

那么文化繁荣的标志又是什么?文化的繁荣不是文化形式的繁荣，不是劣质图书的出版泛滥，也不是人均图书的拥有量和电视频道的多少，更不是什么文艺精品的获奖高低。而是人们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广阔度和自由度，是一个社会对多元思想的宽容度和欣赏度。还可以说，衡

量文化是否繁荣，可以看一个社会有多少多元思想的出现。当一个社会没有出现欣赏优秀思想、欣赏多元思想的氛围时，哪里还能找到什么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多少年来我们已经错把垃圾当成了黄金，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心灵也不再闪光。文化繁荣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所谓“善意的文化政府”，即以公民文化自由最大化为效用标准的政府，能够洞察文化的性质并能够充分倾听文化的批评。真正的文化繁荣之时我们将不再借助于行政、法律、政策来干预文化问题，而是反过来让文化来推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明的进步。

如果要真正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从克服形式主义出发，避免文化的运动化。同时还必须在体制和机制的实质性方面做出重大改革。一是将文化、广电、出版、版权、宣传等部门的职能进行改革升级;二是改革出版机制，开放文化类、学术类报刊;三是改革各级文联、作协和文化研究机构，改革各种奖项评选，将此种机构全部变成民间组织，取消政府财政供养。各种文化类报刊由国家供养变成自收自支;四是设立国家多元文化思想奖，以此激励文化的创造和更新，开阔人们的想象力。

重寻文化繁荣的路径

那么，什么是文化的繁荣路径?说起来简单得出奇。文化的生成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任何权力主导之下进行的文化打造可能事与愿违，既不能满足消费选择的要求，又不能达到主导者的一厢情愿。任何高度控制下的文化不可能结出文化的繁荣之果，任何包含政治主张的文化产业，终不能在社会的沃土上生根成长。

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然而这不是官方主导的结果，我们至今引以骄傲的文化资本大都发生在广阔的民间。改革开放后，表面看来没有了革命年代的文化喧闹，但文化已在民间社会遍地开花。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虽然消失了许多“文化阵地”，但人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任何偏见都无法否定的事实。如果在文化上怀抱客观的事实指认，三十年来，文化的发展已经趋于正确的路径。这样的结果不是权力对于文化的强制和指导，完全作用于市场经济对文化控制的消解，也是文化权力让渡的结果。如果能够理性地观临当下，今天的文化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细枝末节，其文化表达远非昔日能比。



然而，在政绩观的作用下，当下由官方主导的一系列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发展规划、文化主题制造、文化下乡活动和文化广场演出便是对这一进步的反动。文革年代，大唱革命文化是以革命的名义，今天大搞形象文化则是以满足人们文化消费为名。所不同的是，文革文化是一种破坏式建设，今天则是一种建设式破坏。

计划经济年代为什么文化形式单一，文化内容贫乏？不是人们不要文化，而是权力恐惧造成的文化管制，所有的文化必须一个模式，这实际上是少数几个人在向全国人民输送他自己的"文化"。今天的人们回过头已经知道那种文化供给方式既荒唐又残酷，是在剥夺人们的文化权利。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人们一下子涌现出空前的文化热情，各种各样的创造活动呈现了非凡的活力。后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实际上是进一步把文化的权利归还社会，客观上承认了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的需求潜藏在民间的深处，它的前提是文化的自由生产，而文化的自由生产来源于文化的自由表达。如果进行了半吊子的文化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或者又回到官办文化的老路上，文化资源不仅重新被权力所垄断，文化的发展通道还会被堵塞，文化的造假工程会铺天盖地而来。现在有一个危险的迹象是，一些官员开始大力搞文化，因为不懂得文化的规律和生成机理，一下子又被文化开发商绑架了，文化的怪胎便接连出现。

如果想真正让文化繁荣起来，让文化弥漫在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权力对文化的插手越少越好。权力不在的地方，文化的发展肯定是健康的。权力强势的地方，文化必然凋落。这一点儿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根本用不着再论证。只有让权力的手缩回去，文化的民间社会才能形成，文化的创造才符合人们的文化要求，文化在一种生态理性中达到一种成长的平衡。因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内容，文化的表达需要一定的媒介，而表达又需要一定群体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所以就必须放开文化的民间社团和文化出版。任何公开的文化社团，因为生存的需要都会以美好的愿望、目的和活动方式来吸引成员，并在活动中被更多的社会人群认同，从而获得生存和壮大的物质基础。所以，越是对社会有利的文化社团越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并借此立足于社会，否则，不利于社会的文化社团也必然被社会抛弃。权力的焦虑者大多情况下并不明白，文化的民间成长不仅是非暴力的，反而是一种温和的理性，它反对革命、厌倦斗争，只是在自由表达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和构建。由于文化自由表达的实现，会形成真正的公民人格，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良性转型。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没有限制其任何发展可能性的宽松环境，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回应文化公民权利的文化期待，而不是给他们创造他们本不需要的文化形式和景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又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独特性的过程，任何急功近利的大运动模式都与文化的真正发展和繁荣无关。要让文化的发展回归正途，在一个意识形态浓厚的国家进行转型，将与当年市场经的实施一样艰难。因为经济的枷锁容易打开，而文化的禁锢还在“拦得溪声日夜喧”。

（左春和，学者、思想文化评论家。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2922）

【返回目录】



【FMN 一周新闻综述】

浙江织里

10 月 26 日开始，浙江湖州市的织里镇因外地业主拒绝缴纳当地政府设立的“机头税”引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上千人聚集在当地镇政府和镇上的主要街道，当地虽然采取了一定措施，仍未阻止事态的发展，事件发生至今已有 2 日并仍在继续。

新闻：http://cn.fmnnow.com/?p=744
http://fmn.cc/sLaEDw

图集：http://fmn.cc/vEEGZK

官方 10 月 28 日通报称浙江织里镇抗税事件所涉及到的税收代征人员被解聘，织里镇政府已暂停对童装加工户的税收征收。而此事发生至今媒体报道只见当地媒体的官方新闻，只能从当地居民的网络上发消息得知其他情况。

新闻：http://fmn.cc/sDEWMo

10 月 28 日《环球时报》亦发表时评谈论浙江织里的抗税事件，称“无论何因，施暴者都应依法受惩”。但据网友的反应来看，似乎不是很认同将这件事同其他的群体性事件联系起来。

新闻：http://fmn.cc/tXSvqI

湖州当地的媒体 29 日报道称织里镇 140 余家规模以上童装企业已全部恢复正常生产，70—80%的童装经营户已陆续开工开业。当地公安机关称截至 10 月 29 日 18 时已刑事拘留 21 人，行政拘留 51 人。

新闻：http://fmn.cc/uCpZfm

北京空气污染

10 月以来在北京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等相当大的范围内都出现大雾天气，空气质量也明显转差。而北京的全月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仅为 19 天。

新闻：http://fmn.cc/ueVHQD

大雾笼罩北京，中方称是“轻微污染”美使馆测得“有毒害”，北京环保局副局长微博回应空气问题称“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官方数据同民众的感觉存在差距导致民众对环保部门产生强烈的质疑。

新闻：http://fmn.cc/sszlqw
http://cn.fmnnow.com/?p=790

11 月 1 日环保部发布的新测量法首次对 PM2.5 的测定进行了规范，但并未被纳入强制性监测指标。有环保专家表示测量 PM2.5 技术无问题但时机未成熟，只因其污染较重测量后导致空气质量数据大范围超标。

新闻：http://fmn.cc/snzQGG



贵州福泉爆炸

11 月 1 日 11 时 30 分左右，在贵州省福泉市马场坪收费站附近，两辆运送 72 吨炸药的汽车在汽修厂检修时发生爆炸，目前已致 8 人死亡约 300 人受伤，波及方圆 3 公里。有民房被震垮，周围民房、汽车、收费站等均遭到爆炸的破坏。

新闻：http://fmn.cc/shatBT

贵州福泉市的“11·1”运输爆炸事故，还波及了马场坪境内 6 所中小学，现在这些学校已全面停课，事故还造成 54 名学生和 7 名教师受伤。

新闻：http://fmn.cc/uOInzS

据公安机关初步调查，运输炸药的两辆货车均属福泉永远发展运输公司，载有 72 吨炸药。两货车未按规定路线行驶，违规停放在马场坪收费站附近的检测站时，一辆货车燃烧发生爆炸。截至 11 月 2 日，死亡人数仍为 8 人，在医院接受救治的伤员有 218 名，其中重伤 9 人。

新闻：http://fmn.cc/rF46MU

中国网络

中国的六中全会结束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央新闻网站负责人会议，对在网络上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热潮作出部署。要求各网站开设专题，全面、准确、广泛、深入宣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新闻：http://fmn.cc/uhK876

广电总局发布“限娱令”之后，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又表示目前市面上网络游戏充斥的暴力、色情等问题严重，很多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甚至形成网瘾。中国计划建立“严肃游戏”发展机制，拒绝暴力、色情网游。

新闻：http://fmn.cc/tf3lYM

继新浪微博的 CEO 曹国伟表示要对微博进行监管后，腾讯控股主席马化腾也表示，该公司正在研究新的方法对腾讯微博服务上的内容进行管理，阻止虚假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透露有 50 个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的微博客账户被依法关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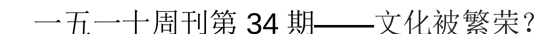
新闻：http://fmn.cc/tj1lVh
http://fmn.cc/sGQrHC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王晨 11 月 1 日表示，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担负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澄清谣言的任务，基层宣传部门要积极用好微博这个平台和窗口，积极“占领”微博阵地，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新闻：http://fmn.cc/rAjPDu







重点新闻

7·23 温州动车事故已经发生了一百天，FMN 对一名伤者的进行了电话采访，他讲述了事故发生时的情景，以及伤愈后同铁道部进行赔偿谈判时所遇困难，尤其是难以克服信息的不透明。最后他表示已经妥协，决定同意铁道方面提出的口头赔偿协议。

新闻：http://fmn.cc/vkKiUi

临近北京 11 月 8 日各区县人大选举，有相关人士总结了中国各地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的名单，其中以真实姓名并有据可查的人就有 90 人，在此放出他们的名单，希望若有你所在地区的参选人，到时可以投他们一票。

新闻：http://cn.fmnnow.com/?p=792

名单：http://fmn.cc/tSxdNK

http://fmn.cc/rzGLXM

10 月 29 日下午，河南省汝南县梁祝镇的派出所所长酒后驾车撞倒 8 人，其中 5 人死亡 3 人受伤，事发后现场群众聚集，而警方对受害者尸体的处置方式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人们掀翻了警方的车辆，而据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表示，他们不仅证件被扣，还被警方拘留。当晚警方进行了清场。

新闻：http://fmn.cc/tjlytG

http://fmn.cc/uLBGvz

图集：http://fmn.cc/w19KiP

11 月 1 日北京地税部门对艾未未的发课公司正式下发了处罚通知书，该公司被控偷漏税 1522 万元，这一数字使民众大感吃惊并表示了不满。此前因批评政府而“被失踪”81 天的艺术家艾未未一直被中国政府被控犯有经济问题。

新闻：http://cn.fmnnow.com/?p=787

今年铁道部负面消息频出导致铁路建设缺乏资金陷入困境，有媒体报道铁道部因拖欠逾千亿工程款，仅中铁股份公司就发生 2000 多起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广东有 3 条高铁因缺钱而停工。为帮铁道部摆脱困境，近期将有超过 2000 亿元的资金支持并确保其资金偿付和重点项目的推进。

新闻：http://fmn.cc/rO6ewq

http://fmn.cc/uzBJ0u

10 月 30 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开展和谐模范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评选活动，称要“充分调动每一座寺庙加强管理、维护稳定的自觉性”，要求僧侣“自觉与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不参与分裂祖国活动，不参加扰乱社会秩序活动”。

新闻：http://fmn.cc/tdAyDR



因抗议非法出租车，河南漯河市 11 月 1 日约 1000 名出租车司机罢驶。罢驶期间，还有司机毁坏几辆非法出租车，希望唤起当局注意无牌出租车经营问题。

新闻：http://fmn.cc/se3W3d

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 10 月 30 日在北京启动。该工程将计划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为全国亿万孩子树立道德榜样。

新闻：http://fmn.cc/t9a82d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各级红十字会要充分认识当前加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学校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而前不久各地家长均表示孩子在校被强制加入红十字会，还缴纳了数额不等的会费。

新闻：http://fmn.cc/t3lh2o

http://fmn.cc/uYGJge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编辑：柏蔚林 姚梧雨童
校订：胡俊熹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王琳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